

伊朗領導權危機之研究

李文政

自一九七九年二月巴勒維被推翻以來，伊朗革命領導者雖曾努力建立各種制度，但由於其一連串失敗的結果，非但没有為伊朗帶來穩定與和平，反使伊朗國內的政治動亂與權力鬥爭更趨激烈，終於導致了領導權的危機。

去（一九八〇）年九月，伊朗與伊拉克戰爭爆發後，一般料想伊朗內部權力鬥爭的雙方或許會基於共同據外的認識，而稍緩其閥牆之爭；豈知相互敵對的兩個派系竟然把權力的爭奪看成比對付外患還要重要，致使權勢的強取豪奪，愈演愈烈。由此足見伊朗內部領導權鬥爭的嚴重性。

今年六月，溫和派的第一任伊朗民選總統巴尼薩德（Abol Hassan Bani-Sadr）在與回教基本主義教派（Islamic Fundamentalists）的一場激烈權力鬥爭中，不幸落敗，且不得不在七月二十八日於左派勢力的掩護下，逃抵法國尋求政治庇護。目前，左派勢力繼巴尼薩德的溫和派之後，已成為回教政權的主要敵對勢力。領導權的爭奪，仍將為伊朗今後政局演變的焦點所在，本文之研究即在對此試作探討。

分歧的領導派系與巴尼薩德的垮台

當一九七九年柯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結束國外流亡生活時，一些在西方國家（尤其是法國）受教育的知識份子亦隨之回到了伊朗。這些知識份子中，以巴尼薩德、高布查德（Sadegh Ghotbzadeh）、及雅茲迪（Ibrahim Yazdi）等人最引人注目。這批人與柯梅尼同樣憎恨巴勒維，推翻巴勒維政權是他們共同的目的。但是，除此而外，在柯梅尼和這些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份子之間，似乎沒有足以使他們進一步緊密聯繫起來的其他因素^①。因此，事實上，從他們回到伊朗開始，回教基本主義

註① 「伊朗將進入更危險時期」，〔南洋商報〕，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教派的宗教勢力與受過西方教育的中間溫和派之間的衝突便已存在。他們的衝突更由於激進派學生、左翼回教份子、以及共產黨的製造與利用混亂局勢而日益嚴重，終而導發了伊朗領導權的危機。

回教革命後，伊朗領導集團係由兩派力量組成。一派以由回教基本主義教派教士組成的回教共和黨 (Islamic Republican Party) 為主，並以已故的該黨領袖兼伊朗最高法院院長比赫希蒂 (Ayatollah Mohammed Beheshti)，伊朗國會議長拉夫桑雅尼 (Hojatolislam Ali Akbar Hashemi Rafsanjani)，以及前任總理拉傑 (Mohammed Ali Rajai) 為主要領導人物。該派實際上掌握了伊朗的行政、立法與司法大權。此外，它還控制著革命衛隊 (Revolutionary Guards) 和革命法庭 (Revolutionary Courts)，對於新聞傳播界亦有相當的影響力。另一派則為溫和派，主要領導人物包括伊朗回教革命後首任總理巴查干 (Mehdi Bazargan)、首任外長雅茲迪、高布查德、以及最近遭罷黜的伊朗首任民選總統巴尼薩德。

一九八〇年一月伊朗大選，巴尼薩德以壓倒性的勝利擊敗回教共和黨候選人而當選總統；同年四、五月間回教共和黨則在國會選舉中獲得絕對的勝利。自此以後，這兩個領導集團間的派系鬭爭更趨於白熱化。由回教神學院所教育出來的人與西方大學教育出來的人之間存有歧見，原本是極為自然的事；更何況他們彼此對經濟發展、外交政策、軍隊組織、以及美國人質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的看法均存有嚴重的分歧。一般咸信，兩派爭執的實質問題是今後的伊朗前途究應依循回教傳統路線抑或走向現代化的途徑，而彼此鬭爭的焦點則為權力的分配。

在巴尼薩德的思想上，融合著回教的色彩與強烈的西方民主自由色彩。因此，在政治上，他主張完全的政治自由與開放的民主，嚴斥回教基本主義教派所主張唯有虔誠的回教徒才有權分享革命成果的看法。他同時主張組成一個由各種力量共同參與的「聯合政府」，反對回教共和黨將所有權力均交付教士手中，而使政權組成百分之百伊斯蘭化的作法。他認為治理國家須由專家為之，姑不論其是否為虔誠的回教徒^③。拉夫桑雅尼曾謂：「總統害怕宗教統治，而我們則害怕自由主義統治」^④。此話最足以表徵兩個派系在政治觀點上的歧異。回教基本主義教派的理想為建立一個「回教神權政治國家」(Islamic theocracy)，而巴尼薩德却希望能建立一個現代化的民主國家。

在經濟上，巴尼薩德主張積極恢復及發展國家經濟，並持有馬克思社會主義的經濟觀點。他強調生產工具的集體擁有，且積極籌劃銀行、保險公司及其他主要工業的國有化。回教教士則辯稱「經濟不是回教社會的支柱」，認為革命的目的並不是在於填飽肚子，而是為了伊斯蘭^④。

註③ 參閱 Tony Allaway, "Why the lion of Iran no longer roars," *The Times*, June 16, 1981, p. 12.

註④ 「伊朗政局的重大變化」, [大公報],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註④ 參閱 Tony Allaway, *op. cit.*, [大公報],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此外，在對外政策上，巴尼薩德主張採取中立的不結盟政策，加強和第三世界及西歐、日本的關係，緩和與美國間的緊張關係；並認為當前伊朗最迫切的威脅是來自北方的蘇俄。基本主義教派者雖亦反對兩個超級強權，但認為美國是伊朗的頭號敵人，並主張伊朗應向全球輸出回教革命。再就軍事組織言，巴尼薩德認為伊朗武裝部隊的主力為正規軍，強調強化三軍部隊的必要性。回教教士爲了抵制巴氏，深恐他在軍中擴展勢力，乃積極發展其控制下的革命衛隊。

對上述基本問題之見解不一，遂令巴尼薩德溫和派與回教基本主義教派間的隔閡日深。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美國人質問題發生後，溫和派的巴查干總理下台，有關人質的釋放或審判問題，更成爲雙方權力鬭爭的一部分。巴尼薩德公開指責回教激進學生扣押美國人質之不當，並批評回教共和黨不應支持學生的舉措。他認爲伊朗當急之務爲解決經濟與其他迫切問題，因此極力欲與美國達成人質釋放的協議。回教共和黨則利用伊朗人民幾近瘋狂的反美情緒，指控巴氏爲一位傾向西方的自由派份子，認爲他將使伊朗重行投向美國帝國主義或歐洲國家的懷抱^⑤。此項指控給予巴尼薩德相當大的打擊，終於迫使他撒手不管人質問題，惜爲時已晚，蓋以伊朗革命團體與柯梅尼業已對他表示不信任了。一九八〇年八月回教基本主義教派的拉傑繼任總理，更構成對巴尼薩德脆弱領導權力的威脅。

一九八〇年九月兩伊戰爭的爆發，表面上似乎使得兩個領導集團派系間的針鋒對峙局面稍見緩和，但實際上彼此間的權力爭奪仍在暗中滋長。同年十月三十一日巴尼薩德致函柯梅尼提出解散拉傑政府的要求，以及基本主義教派者極欲控制伊朗社會的企圖，使得內部權力鬭爭的情勢益加緊張。

巴氏在給柯梅尼的信件中，抱怨地指出：(1)對於人質問題，伊朗應該採取溫和的立場，甚而不惜作爲一個屈服者，而不應該採取強硬的立場；(2)拉傑政府無法應付伊朗當前情勢，國家命運不應操於那些對國家處境茫然無知且沒有能力之人的手中；(3)基本主義教派者一味追求權力而非宗教信仰，他們應該對伊朗軍隊的積弱負責，巴氏並要求柯梅尼授予他充分的權力，以統一指揮三軍^⑥。

柯梅尼雖然不滿於巴尼薩德的政治哲學，但仍接受了他的建議，認爲教士確不應該干涉軍隊的事務。在十一月六日的演說中，柯梅尼即明白表示：「那些並非專精於軍事知識的人（按指教士言），不得干預軍事事務。此正如一位陸軍上校要告訴我們什

註⑤ R. K. Ramazani, "Iran's Revolution: Pattern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7, No. 1, Winter 1980-81, pp. 453-455; Vahé Petrossian, "Iran's Crisis of Leadership," *The World Today*, Vol. 37, No. 2, Feb. 1981, p. 40.

註⑥ James Dorsey, "Power battle in Iran—Khomeini, Bani-Sadr rift widened by 'leak',"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 8, 1980, p. 6.

麼是回教革命一樣」^①。經柯梅尼如此一言，教士對軍隊的影響力確大為削減，然而也就因為教士深恐巴尼薩德的聲望從此昇高，乃更積極尋找機會與其對抗。

一九八一年初，柯梅尼對於伊朗領導派系的權力爭奪似乎尚能持中立超然立場，但迄至三月間，當兩派權力鬭爭正熾時，他却又偏袒於教士們。此際，他發佈了十點訓令，禁止巴尼薩德與三位基本主義教派的領導者公開發表演說。同時爲了解決派系爭端，他復於三月十六日下令組成三人協調委員會。不幸的是，該委員會竟一面倒向基本主義教派者。一九八一年六月五日，三人委員會公然譴責巴尼薩德有觸犯憲法及違犯柯梅尼十點訓令之嫌，並要求檢察長（亦爲教士）查禁巴氏所辦的報紙——「回教革命報」(Islamic Revolution) 與另外五家支持巴氏的報紙。六月十日，柯梅尼解除了巴尼薩德三軍總司令的職位。翌日，伊朗最高法院院長比赫希蒂表示將繼續對總統的行爲進行法律調查。顯然教士們的下一目標乃在將巴尼薩德從總統的職位上趕下來。六月二十一日伊朗國會以一百七十七票對一票通過宣佈巴尼薩德總統政治無能的議案後不久，伊朗最高法院檢察長即發佈逮捕巴氏的命令。次日，柯梅尼正式解除巴尼薩德總統的職位，確定了巴氏被鬭垮下台的命運，而其下台實際上是由比赫希蒂所一手導演的。

巴尼薩德溫和派失敗的原因及影響

巴氏生於一九三三年，其父爲知名的回教什葉派 (Shi'ite) 領袖，自幼受過嚴格的宗教教育。隨後，在一九五〇年代初期的伊朗政治衝突危機中，他投身於對抗巴勒維的民族主義運動。一九六三年巴尼薩德參與柯梅尼所領導的反巴勒維叛亂，遭逮捕入獄，旋被逐出國門。在法國留學期間，他更熱衷於支持柯梅尼的反巴勒維政治活動。是以，當柯梅尼遭伊拉克驅逐出境而流亡到法國時，巴尼薩德即成爲柯梅尼身邊三位得力的非教士助手之一。一九七九年二月，他隨柯梅尼回到伊朗，立即受到柯梅尼的器重，先後擔任經濟部長、總統及三軍總司令要職，爲伊朗紅極一時的人物；然在短短的兩年多內，却迅即落到被罷黜流亡的下場，歸納其失敗原因大抵不外下列數端：

缺乏廣泛羣衆基礎的支持，是巴尼薩德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一般來說，巴尼薩德的支持者爲來自中產階級的公務員、雜貨市場貿易商 (bazaar traders)、以及軍隊中的中、低級軍官，未能深入廣大羣衆。一九八〇年的伊朗總統選舉，由於柯梅尼的鼎力支持，致使巴尼薩德以百分之七十五點五的選票，獲得壓倒性的勝利；但是他却未能乘勢積極組織政黨，也未在下層社會中

註① *Ibid.*

建立起屬於他自己的廣大權力基礎。是以，他雖然成功於總統的選舉，却又失敗於與回教教士的權力鬭爭中。雖然他曾經在許多城鎮設有「人民與總統合作協調辦事處」(the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People's Cooperation with the President)，擬藉這些辦事處匯集支持他的力量，以奠定其建黨的羣衆基礎，惜以這些辦事處在一九八一年六月十日均遭回教共和黨所控制的政府，宣佈爲非法組織^⑧。此外，在巴氏與回教共和黨衝突晚期，幾乎所有支持他的報紙與廣播電視台若非被關閉卽爲回教共和黨所接管，他甚至亦被柯梅尼禁止公開發表演說。如此一來，他幾乎完全被隔絕於羣衆之外，自無權力基礎可言。

伊朗宗教精神領袖柯梅尼的偏袒回教基本主義教派，則註定了巴尼薩德在兩派權力鬭爭中失敗的命運。此乃由於柯梅尼對伊朗人民仍具有相當大的號召力，因此他們尚不敢公然違抗柯梅尼而支持巴尼薩德。在伊朗領導權鬭爭的初期，雖然柯梅尼的立場莫測高深，反反覆覆，但基本上，他還是傾向於教士們，而不滿巴尼薩德的政治哲學，認爲他是一個具有親西方傾向的知識份子。他深恐巴尼薩德重建伊朗經濟的計劃實現後，將使得回教教士在伊朗社會中的聲望大爲低落。柯梅尼本身是一個教士，且欲成爲伊朗人民心目中的精神領袖，所以他必須先得到宗教勢力的支持。其次，他更恐懼巴尼薩德勢力的伸張，將破壞其所建立的回教共和體制。因此，柯梅尼採取一種「分而治之」(divide-and-rule)的策略，意欲造成伊朗內部許多相互對立的政治派系，避免任何勢力過於強大而難以駕御^⑨。基於此，巴尼薩德在當選總統後似乎很受柯梅尼重用，被委任爲革命委員會 (Revolutionary Council) 主席兼三軍總司令；然事實上，這只不過是一種「權宜之計」罷了。緊接著在國會選舉中，柯梅尼卽協助回教共和黨取得了絕對的勝利，並以強硬派的拉傑爲總理以制衡巴尼薩德。柯梅尼爲伊朗革命的象徵，即使他與無法應付伊朗混亂局勢的教士們有密切的關係，但他仍然爲人民所信任，否則革命將無法繼續推展。此爲巴尼薩德在權力鬭爭中失敗的另一主要原因。

回教共和黨勢力的囂張爲迫使巴尼薩德下台的直接因素。教士們在政治鬭爭中之所以獲勝，主要是因爲他們解釋可蘭經是與柯梅尼的良知指示相一致的，以博取人心。因此，巴尼薩德對抗教士們的基本策略，一方面是設法贏取人民的向心力，一方面則避免與柯梅尼直接衝突。他希望在兩伊戰爭結束及柯梅尼死後，能在人民的擁護下，利用其總統的權力，擊潰基本主義教派^⑩。

註⑧ "Extremists demand Bani-Sadr's death," *The Guardian*, June 12, 1981, p. 7. Anthony Hyman, *Where next in Iran's Power Struggle?*, *Hongkong Standard*, June 25, 1981, p. 9.

註⑨ Patricia Blake, "Terror in the Name of God," *Time*, July 6, 1981, pp. 6-7.

註⑩ 參閱 Tony Allaway, *op. cit.* "Off with his head," *The Economist*, June 20, 1981, pp. 15-16. 巴尼薩德認爲沒有一位教士能繼柯梅尼之後受到伊朗人民如此般的推崇，因此，柯梅尼死後實爲剷除教士權力的機會。此外，就一般來說，軍人較傾向於巴尼薩德而對教士並無好感，因此，巴氏認爲當兩伊戰爭結束時，他將可以在軍人的支持下，打擊教士勢力。

但教士們瞭解巴尼薩德的此一謀略，認定巴尼薩德為所有反對基本主義教派勢力的中心，於是另一方面想盡各種辦法，欲使巴尼薩德陷於與柯梅尼對峙的困境中；另一方面則欲使兩伊戰爭無限期延長，令巴氏和軍隊專注於前線戰事而無暇防阻回教共和黨在國內勢力的伸張。巴尼薩德的當選總統與兼任三軍總司令，為溫和派在權力鬥爭中所獲得的最大勝利，然而也就是由於這次的勝利，更促使宗教勢力下定決心，非除掉巴尼薩德不可。依據伊朗憲法第一百三十條和第一百三十一條的規定，一旦總統出缺時，將暫由國會議長、總理與最高法院院長所組成的「總統臨時委員會」(Temporary Council of the Presidency)執行總統職權^⑩。如此一來，由回教共和黨控制的「三頭政治」實際上可謂完全剝奪了巴尼薩德溫和派的權勢。巴氏亦曾有以辭職、付諸公民表決，來鞏固其地位的構想。蓋當總統改選時，國會亦須同時改選。巴氏認為由於人民普遍不滿回教共和黨的統治，因此在新的國會選舉中，該黨必將喪失甚多席位。然而，巴氏此一構想確有其難行之處，因為依憲法規定，若總統與國會對任何重大問題意見不一而欲付諸公民表決時，必須獲得三分之二國會議員的通過^⑪。此在回教共和黨控制國會的情況下，根本無實現的可能。

此外，巴尼薩德的個人性格也是構成他失敗的原因之一。巴尼薩德是一位溫文儒雅的學者，他本質上是一個思想家而非政治鬭爭的能手。他希望在一個相互容忍的政治體系中，以和平合作的手段來建立起現代化的國家，而不願訴諸流血衝突。然而他的政敵比赫希蒂與拉傑均為手段強硬與心地兇狠的政治鬭爭能手，巴尼薩德自非這些人的對手，其失敗亦是可事先料定的。

巴尼薩德的垮台，意味著在柯梅尼的回教共和國中，伊朗中產階級竭力維持「西方模式」的夢想將從此破滅，推動伊朗現代化的主力亦將就此消聲匿跡。此或可謂係伊朗的不幸。巴尼薩德受過西方教育且奉獻於回教，他決心為實現伊朗回教共和國的理想而努力。一般預料，伊朗如在他的實際掌政下，將極有可能走向進步與開明的途徑。如今教士們贏得了這場權力鬭爭，隨之將使伊朗陷於殘酷與反對開化的統治之下。今後伊朗的中產階級只有兩條途徑可循，即若非屈從於嚴苛的回教專制政權之下，便是必須繼續為其生存而奮鬥。依當前情勢看，雖然中產階級已處於劣勢，但他們似已決定附合於伊朗左派勢力繼續對抗回教教士。巴尼薩德的失敗，除了表示他個人命運的可悲外，亦反映出伊朗政局又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反對宗教勢力的最後一股合法且較大的力量已經消失，今後的伊朗不是完全由教士勢力控制，就是陷入更嚴重的暴力衝突與動亂的時代。上(八)月三十日，新上任不久的總統拉傑與總理巴荷納(Hojatolislam Mohammad Javad Bahonar)雙雙遇害，業已顯示回教勢力似無可能穩固地掌握政權。伊朗內部權力鬭爭明顯地已進入武力衝突的階段，亦即槍彈與炸藥代替了政治談判。目前的權力鬭爭將由回教基本主義教派與左派份子的組織，利用暴力手段來爭權奪勢^⑫。內部武力衝突的結果是否可能招致外來的干預？甚至是否可能演變

註⑩ "Constitution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Spring 1980, p. 200.

註⑪ Bill Baker, "Iran leader fights back at his critics,"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e 3, 1981, p. 4.

註⑫ Bill Baker, "Iran's Clerics March to Political Primacy,"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e 24, 1981, p. 3.

成內戰？實為當前伊朗所面臨的隱憂。

回教教士掌政對伊朗政局的影響

自從巴尼薩德被罷黜後，總統職權立即由基本主義教派的國會議長、最高法院院長及總理三人組成的總統委員會 (Presidential Council) 接掌，該委員會並依據憲法規定籌劃在五十天之內舉行總統選舉，而總統候選人亦必須獲得由教士所控制的「憲法維護委員會」(Council of Guardians of the Constitution) 的通過。因此，由基本主義教派者接任總統乃是必然之勢。然而，出乎意料之外的，在今年六月二十八日，正當回教共和黨的領袖們在德黑蘭的該黨總部舉行會議時，突然發生強烈的爆炸案，炸死了一般威認權勢僅次於柯梅尼的比赫希蒂及另外七十三位基本主義教派的領導人物^⑭。

據稱由左派「人民十字軍」(Mujahideen-e Khatq) 組織所引發的爆炸案，曾予回教基本主義教派者一次沉重的打擊。爲了顯示他們並非沒有控制伊朗局勢的權力，並嚇阻反對份子的報復行動，基本主義教派乃恢復他們在革命初期的恐怖屠殺異己作爲，並且按照預定計劃，進行總統選舉。

在七月二十四日的總統選舉中，回教共和黨候選人拉傑在柯梅尼的極力支持下，獲得一千四百八十萬張選票中的一千三百萬票，以壓倒性的勝利當選爲伊朗回教共和國第二任總統^⑮，隨後並由拉傑任命巴荷納爲總理，使伊朗局勢進入一個由回教教士統治的新階段。其後伊朗所走的路線勢將較過去更要孤立和極端。

一般認爲，回教教士的統治伊朗，將可能對伊朗政局造成下述的影響^⑯：

(一) 在政治上：伊朗今後將成爲一黨專政的國家。在柯梅尼一味支持教士的情勢下，接受西方教育主張自由民主之溫和派勢力，至少將消聲匿跡一段時間。在最近的總統選舉中，雖然巴尼薩德一再呼籲選民杯葛選舉活動，但是並沒有得到他所應有的支持，足資佐證。目前回教教士極欲剷除與巴尼薩德有往來的其他溫和派人士，此將迫使這些人轉而從事地下工作，甚至投靠主張武裝鬭爭的極端份子。

(二) 在經濟上：近來伊朗情勢的混亂不安勢將對已瀕臨崩潰邊緣的伊朗經濟，造成惡劣的影響。革命運動後，積極從事建立伊

註⑭ William E. Smith, "Iran Lurching Bloodily Onward," *Time*, July 13, 1981, p. 11. 在這次爆炸案中被炸死者除了比赫希蒂外，尚包括有運輸、郵電、電力及福利部的四位部長，六位副部長，二十七位國會議員，以及其他具有重大影響力的人物。

註⑮ "Rajai takes over in Iran as Paris 'gags' Bani-Sadr," *Hongkong Standard*, Aug. 4, 1981, p. 5.

註⑯ 參閱 Bill Baker, "Iran races toward total mullah rule,"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e 18, 1981, pp. 1, 6.

朗新經濟秩序之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份子，在歷經三個階段的權力鬭爭後，業已完全被排拒於政府之外。該三階段為：(1) 巴查干政府時被罷黜的民族陣線知識份子；(2) 美國人質危機後被逐的巴查干集團；(3) 最近遭罷黜的巴尼薩德派份子。當前負責重建伊朗經濟的為拉傑這班人，他們的教育水準均未超過高中程度，其學識能力，均有問題。因此，一般推測今後的伊朗經濟處境將更為艱難。

(二) 在軍事上：高級軍事指揮官在目前別無選擇餘地，唯有聽從教士的指揮。只要兩伊戰爭繼續僵持下去，他們即將在前線疆場疲於奔命，無暇顧及國內政局的演變。然而，一旦戰爭結束時，普遍傾向於巴尼薩德的中、低級軍官很可能發動一次類似利比亞的軍事政變。

(四) 在法律與社會上：最令溫和派人士感到畏懼的是，教士們可能通過新的「報應法案」(Retribution Bill)，致使伊朗回復到昔日「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恐怖歷史時期，而無分野蠻與公道。譬如，在該法案下，倘若一個人在車禍中失去了一條腿，那麼他就可以要求肇事者賠償一條腿；又如被謀害者的家人也可以殺害兇手以為報復。由此顯見該法之野蠻荒謬。此外，有關婦女地位問題，也可能成為教士立法的主要標的。目前規定婦女在政府辦公室裏必須帶上面紗，將來她們可能被迫在街上與公共場所亦必須如此。許多伊朗婦女深恐如果教士繼續掌政下去，她們很可能被排斥於辦公室的工作之外，而只能就學於烹飪與護士學校。

回教共和黨雖然打垮了巴尼薩德，但此種勝利其實是在弱勢的狀態下達成的，他們勢難維持並鞏固他們的戰果。正如伊朗地下組織的「伊朗自由之聲」(Free Voice of Iran) 廣播電臺諷刺的評論謂：「在真正的民主國家裏，人民依據他們自己的選擇，投票選出總統；但是在柯梅尼統治的伊朗，總統却先經他遴選後，才由人民來投票」^⑤。回教共和黨的擊敗巴尼薩德與拉傑的當選總統完全是因為柯梅尼在最後助了他們一臂之力的緣故。此亦顯示了教士本身並非擁有廣大羣衆的支持。

回教共和黨之得以控制伊朗，乃是由於它在去年的國會選舉中，贏得了多數席位的勝利。然而事實上在那次選舉中，回教共和黨所獲得的支持並未超過伊朗所有合格選民的百分之十七點三。在伊朗全國二百七十一個選區中的一百九十八個選區中所舉行的選舉，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選民並未參加投票^⑥。

今天控制政府、國會、革命衛隊與法院的教士多數係柯梅尼以前的學生。有人認為，一旦宗教精神領袖柯梅尼死後，他們的影響力必將隨之衰竭，加以他們無所不用其極的殘殺異己，更招人民非議。是以，到時候伊朗可能陷入內戰中。美國芝加哥大學

註⑤ Bill Baker, "Iranian elections: Rajai the shoo-in,"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ly 24, 1981, p. 3.

註⑥ Amir Taheri, "The Defeat of Bani-Sadr,"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ne 20-21, 1981, p. 4.

的伊朗問題專家諾尼斯(Marvin Zonis)即曾謂：「在柯梅尼死後，將無人能具有同樣非凡的領導能力，以維持伊朗的團結統一，全國各地形將劫掠四起」^⑨。反之，諾尼斯亦認為，如果柯梅尼不死且教士繼續執政的話，則左派的反對勢力也將日益壯大。此外，回教共和黨並不能代表伊朗所有的回教教士。該黨宣稱有七千多名教士黨員，但在伊朗境內却有多達八萬多名的回教教士。另外在六位地位最崇高的「遵奉真主者」(Ayatollah)中，也只有柯梅尼一人支持回教共和黨對抗巴尼薩德。再者，回教共和黨內部也有嚴重的派系分裂。一派主張伊朗與在波斯灣地區的一些親俄激進國家結成聯盟，以進行「永久革命」；對兩伊戰爭，該派則主張藉回教世界反抗帝國主義之名，將衝突擴展到整個波斯灣地區。另一派主張先求鞏固黨在伊朗國內的權力基礎，然後再來決定外交事務；對兩伊戰爭則希望能儘速解決，以利回教共和黨對伊朗的統治^⑩。此種黨內意見的分歧，恐將暗伏著另一個新的內部權力衝突，而左派勢力的積極拉攏溫和派人士乘隙擴展實力，以及對掌政於德黑蘭的什葉派充滿敵意的遜尼派(Sunni)少數民族，則構成回教共和黨政權的外在隱憂。

左派勢力危及教士領導的穩定性

在伊朗局勢動亂不堪的情況下，比較傾向西方的溫和派勢力，顯然已遭回教宗教勢力徹底的排斥，短期內幾乎難有所作為。此種客觀情勢對野心勃勃的伊朗左派反政府勢力，無異提供了一個非常有利的奪權時機。左派勢力今後勢將招納那些被罷黜的溫和派人士，以擴展實力，對抗教士「神權政治」的統治方式。

在反對回教基本主義教派的左派勢力中，組織規模最龐大且最完善的勢力為混合了回教意識型態與馬克斯主義意識型態的「人民十字軍」團體。該團體成立於一九六五——六六年間，初期是一個反抗巴勒維政權的武裝鬪爭團體，迄巴勒維下臺後，轉而反對回教共和黨而支持巴尼薩德，其目的為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回教共和國」(Socialist Islamic Republic)。它在德黑蘭設有堅強的據點，並在伊朗北部擁有極大的影響力，其羣衆基礎來自大學生、工程師、醫生等知識份子；且近年來其組織成員已隨著教育普及而與日俱增。據估計這個由拉加維(Masud Rajavi)領導的組織，目前約有十萬名武裝游擊隊與數百萬的支持者。他們的武裝與訓練均係沿習傳統的城市游擊路線^⑪。

另一個反對回教共和黨的激進派組織——「人民戰士」(Fedayeen-e khalq)亦成立於一九六〇年代初，為無神論的馬克

註⑨ William E. Smith, *op. cit.*, pp. 12-13.

註⑩ Amir Taheri, *op. cit.*

註⑪ 參閱 Shahram Chubin, "Leftist Forces in Iran," *Problems of Communism*, July-August, 1980, pp. 15-18; William E. Smith, *op. cit.*, p. 12.

斯主義者團體。它接受利比亞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援助，過去在對抗巴勒維政權時，曾扮演重要的角色；其後因實力大損，目前對抗回教政府的活動亦相對的減少。「人民戰士」團體的主要羣衆基礎亦同樣來自大學生，其組織成員約有八萬人之譜。該組織後因內部主張不同而分裂爲反對回教基本主義教派與支持傳統上親蘇俄之杜德黨（the Tudeh Party）的兩個派系。杜德黨爲莫斯科支持下的伊朗共產黨，成立於一九四一年。雖然該黨的實力不大，尚不足單獨構成對回教政府的威脅，但令人擔憂的是，蘇俄或可能乘伊朗局勢混亂時，進犯伊朗支持杜德黨奪權。杜德黨爲了擴展本身實力，表面上雖似支持基本主義教派，然實際上它却始終依循其滲透政府的傳統策略。此亦爲回教政權所不應忽視的一項威脅^②。

雖然這三個左派勢力對付教士政權各有不同的策略，但他們對下列問題依然具有共同的想法：(1)完全的社會變遷與全面性革命乃是必須的；(2)伊朗必須實現一個沒有階級劃分的社會，援助被壓迫者，建立工人自治，以及由國家管制對外貿易；(3)伊朗革命是與一般革命鬭爭（即反猶太主義、反資本主義）不可分的，革命的主要威脅是來自西方；(4)必須解散伊朗武裝部隊，代之以效忠人民的部隊或民兵；(5)伊朗政府對少數民族的自治要求，應該更加予以寬容^③。基於上述的共識，伊朗左派勢力間目前確有相當程度的合作，對教士領導權的穩定性實構成相當的威脅。

左派游擊隊的策略目標之一爲，藉回教教士對敵對者的嚴酷報復及對人民的迫害所造成的反響，以爭取人民的支持。回教教士未能解決伊朗嚴重的經濟問題，加上他們大肆使用暴力，遂令回教政權喪失民心。因此，自巴尼薩德下臺後，拉加維等即利用人民普遍不滿教士統治的情緒，領導游擊隊反抗回教政權，從事街頭爆炸與暗殺活動。回教政府則報以大肆逮捕與槍殺左派份子，以圖嚇阻反對勢力的囂張。只不過這種手段究竟能否成功地抑制左派份子，抑或使他們更加強硬起來，則頗值懷疑。

事實上，基本主義教派的領導者業已逐漸了解到「人民十字軍」將成爲反教士的勢力中心，而不得不採取謹慎的態度。是以，當今年六月德黑蘭爆炸事件發生後，對於「人民十字軍」的譴責即非常的審慎，蓋以：(1)基本主義教派者可能仍缺乏令人信服的證據，以證明該組織應對這次爆炸事件負責；(2)如認定「人民十字軍」應對這次事件負責，即等於宣佈將與之對抗到底，但目前教士領導者似無法確信他們能與「人民十字軍」對抗，並贏得勝利；(3)基本主義教派者瞭解到，昔日支持推翻巴勒維革命的人多已逐漸覺醒，並起而反對教士統治^④。

註② Geoffrey Godsell, "Can Bani-Sadr fight back?"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e 22, 1981, p. 11. 有關杜德黨與「人民戰士」組織的詳細情形亦請參閱Shahram Chubin, *op. cit.*, pp. 3-15.

註③ Shahram Chubin, *op. cit.*, p. 19.

註④ Geoffrey Godsell, "Iran awaits a showdown- fundamentalists vs. leftists,"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ly 3, 1981, p. 3.

當巴尼薩德溫和派在感到孤立無援而不得不投靠左派勢力時，「人民十字軍」亦主動爭取巴尼薩德的携手合作，因而產生了一個伊朗權力鬭爭的新局面。七月十八日，逃亡的巴尼薩德在給拉加維的信中，曾私自任命拉加維為伊朗總理，並要他承擔起組織對抗基本主義教派的「全國抵抗委員會」任務²⁵。緊接著於二十八日，巴尼薩德在拉加維的護衛下，安抵法國獲得政治庇護，並表示他將不會放棄他身為伊朗總統的合法責任，呼籲伊朗人民起來推翻回教專政。此當可顯示出，左派勢力業已結合了巴尼薩德的溫和派力量，準備伺機起而打倒回教政權。

巴尼薩德與拉加維的相借逃離伊朗，並非意味著伊朗內部領導權的衝突將就此平息下來。他們的結合業已表示了與伊朗回教政權勢不兩立的态度。當八月三日拉傑宣誓就任總統後不久，在總統辦公室附近曾發生了一件爆炸案，以及同月三十日，總理辦公室的被炸，致使拉傑與巴荷納喪命等，諸如此類的爆炸、暗殺案在伊朗國內仍層出不窮，正足以反映出國內充滿著對政府不滿的氣息。柯梅尼在拉傑總統就職儀式中曾告誡拉傑說：「如果你走錯一步，明天你就會看到你的一千三百萬選民高呼『處死拉傑』，在經過一場革命之後，羣衆大概不會無條件地屈從任何人了」²⁶。此話所隱含的意義實至為深長。

少數民族自治問題，尤其是庫德族 (Kurd) 的分離運動，數世紀以來始終困擾著伊朗執政當局。基本主義教派當權後，這些屬遜尼派回教徒的少數民族對於伊朗回教政權的敵意更由於受到兩伊戰爭的鼓舞而蠢蠢欲動。左派勢力乃因勢利導，藉支持少數民族的自治運動為名，拉攏這些民族以強化對抗德黑蘭回教政權的實力。

結語

任何政權的穩定與維持長久，有賴於某種階級勢力或利益團體的支持。伊朗回教革命的成功，推翻了所有昔日巴勒維時代的權力中心，但是却未能隨後建立起新的鞏固領導，致造成領導派系的爭權奪勢。巴尼薩德溫和派的失勢，主要也是由於在面臨回教共和黨的挑戰下，沒有屬於他自己之政黨的支持所致。

個人化權力 (personalized power) 為伊朗領導型態的主要特徵。在此種情況下，國家的統治權並不在於職位，而在於個人意識型態、派系與個人也就經常成為促使領導權無法穩定的導因。就此而言，權力本身的未能制度化，實為構成伊朗領導權危

註²⁵ [星島日報]，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註²⁶ [伊明局勢何去何從?]，[大公報]，一九八一年八月五日。

機的一項重要因素。柯梅尼爲伊朗回教革命的精神領袖，他的意向決定了伊朗領導權的更迭，是以，在他的支持下敵對派系的巴尼薩德與拉傑先後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而當選總統。但是柯梅尼的此種權勢純爲一種個人化而非制度化的表現，他本人一旦死去，其繼承者能否如他一般獲得人民支持且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則頗堪慮。

回教共和黨由於獲得柯梅尼的支持，加以伊朗人民智未開（伊朗人民有百分之六十五屬文盲），無法接受開明自由份子的觀點，因而能在一場劇烈的奪權鬭爭中，擊敗巴尼薩德的溫和派。依目前情勢發展看來，教士們似已掌握了相當大的權力，但他們能否穩固其權力基礎，繼續獲得下層社會的支持，以及倘若它不能獲得下層社會的支持，那麼在沒有羣衆基礎的支持下，它能否對抗巴尼薩德與左派勢力結合的挑戰，則爲問題之所在。是以，伊朗今後局勢演變的主要關鍵爲，柯梅尼與拉傑及巴荷納的繼任者將採取什麼樣的新政策，以及伊朗人民對新政策的反應如何？

蠡測伊朗局勢的未來發展，吾人或可看出下列端倪：（一）伊朗內部的權力鬭爭與武力衝突，並不會因爲巴尼薩德與拉加維的流亡國外以及拉傑與巴荷納的死亡而告休止，相反地，未來的派系鬭爭將由原來回教基本主義教派與溫和派兩個派系的對峙，演變成更爲複雜的情勢，反政府的左派勢力及共產黨亦已捲入另一場新的武裝權力鬭爭漩渦中。（二）此後回教教士們將更加緊地尋求控制伊朗政治，也將對反政府勢力採取更強硬的措施。八月二十日，伊朗回教革命衛隊突襲「人民十字軍」的德黑蘭總部及最近教士對左派份子的大肆報復，業已顯示伊朗回教政府決心採取嚴厲行動對付這個最大的左派反政府組織^②。如果回教共和黨伴能嚴密地掌握伊朗，則對阿拉伯世界與西方國家來說，實非好事；蓋以「革命輸出」向爲柯梅尼的主張，此將危及他國的安寧。（三）回教教士們一般均缺乏行政經驗與知識，加上他們保守的神權政治觀念，將使伊朗今後更沿著宗教政治的路線發展，令伊朗現代化無由推展，更何況他們是否有能力妥善處理困難重重的伊朗政治與經濟等問題，亦令人生疑。也正由於教士的普遍無能與無知，伊朗的青年、少數民族、工人與知識份子已有逐漸傾向左派勢力的趨勢。教士、軍隊、好戰的左派份子、以及不滿的少數民族，將爲影響日後伊朗政局演變的四大主流。

（本文作者係本中心助理研究員，一九八一年九月三日完稿。）

註② *Hongkong Standard*, Aug. 22, 1981, p. 5.